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学刊

藏學學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30 辑

2024 (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2024 (1)

中国藏学出版社

目 录

青海省玉树市泽琼沟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1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断原因考	陈凯源 / 22
透物见史：西藏阿里普兰县纳曲宗普石窟壁画研究	多杰仁青 / 44
写本学视域下的汉藏文化交流——以敦煌 P.2449 为例	朱利华 / 82
古印度医学时令与疾病关系学说之文献研究——以《金光明经·除病品》为 中心	刘英华 党素萍 / 98
清朝在康区的早期经略与“治藏必先安康”策略之雏形（1644—1748 年）	王丽娜 / 130
两次廓尔喀战争期间中国与尼泊尔和谈考释——以丹津班珠尔为中心	黃全毅 / 144
清末驻藏左参赞罗长祺事略	康欣平 / 176
民族叙事与流行文化：藏獒形象在西方的变迁（1783—1945）	黃田 / 196

- 云南贡山迪麻洛藏族婚礼中的文化合成研究 李锦 罗娜娜 / 216
- 印度学界有关喜马拉雅南麓博多 (Bodo) 族群研究综述
..... 方天建 何品东 / 232
- 一份回鹘相关古藏文文献的新译释
..... [美] 费德里卡·文图里 著 吐送江·依明 陈泳君 译 / 249
- 郭尔-布村再次发现的拉喇嘛益西沃藏文碑铭
..... 拉克斯曼·塔吉尔 著 李俊 译 / 277
- 摘要 / 285

Table of Contents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uddhist Rock Carvings at Zeqiong Gully in Yushu of Qinghai <i>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i>	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i>Uṣṇīṣavijaya Dhāraṇī Sūtra</i> Illustration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ubo Occupation Period <i>Chen Kaiyuan</i>	22
A Study of the Murals in Nachu Dzongpuk Cave, Purang County of Ngari Prefecture, Tibet <i>Dorje Rinchen</i>	44
Sino-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dicology: 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P.2449 <i>Zhu Lihua</i>	82
A Textu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son and Disease Based on Buddhist and Ayurvedic Texts: The "Elimination of Disease" Chapter of the <i>Sūtra of Golden Light</i> <i>Liu Yinghua and Dang Suping</i>	98
Early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Kham and the Nascent Form of the "Stabilizing Kham as Prerequisite for Governing Tibet" Strategy (1644–1748) <i>Wang Lina</i>	130

A Study of Peac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epal During the Two Gurkha Wars: Centered on Bstan 'dzin dpal 'byor <i>Huang Quanyi</i>	144
Short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Luo Changqi: A Left Assistant Amban of Tibe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Kang Xinping</i>	176
National Narrative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Tibetan Mastiff in the Western World (1783–1945) <i>Huang Tian</i>	196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ibetan Weddings: A Case Study of Dimaluo, Gongshan County, Yunnan <i>Li Jin and Luo Nana</i>	216
A Review of Indian Scholarship about the Bodo People on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Himalayas <i>Fang Tianjian and He Pindong</i>	232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Federica Venturi</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Tursunjan Imin and Chen Yongjun</i>	249
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IHa Bla ma Ye shes '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i>Laxman S. Thakur</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i Jun</i>	277
ABSTRACTS	285

一份回鹘相关古藏文文献的新译释^{*}

[美]费德里卡·文图里 著

吐送江·依明 陈泳君 译

内容摘要：古藏文文书 P.t.1283 是研究古突厥、回鹘等民族历史的珍贵史料，该文书自面世起，相关研究就络绎不绝。这篇文章即为该文书的研究成果之一。文章前半部分主要是对 P.t.1283 号文书概况的简要介绍，涉及标题、语言、母本等衍生的疑问。同时，文章前半部分也就诸前贤对文章的研究状况作了综述。而文章后半部分则主要提供 P.t.1283 号文书第二部分新的译注，并且对文书识读不清的、前人内容存在问题的部分作了重点论述。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外藏回鹘文献研究与整理”（20&ZD211）的阶段性成果，获得兰州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本文译自 Federica Venturi,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42, 2008 (1): 1-35。感谢作者授权翻译。

原注：本文的写作得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中欧亚研究所（the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at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诸位教授、研究员的大量帮助、建议与意见，包括艾骛德（Chris Atwood）、白桂思（Chris Beckwith）、包文德（Gardner Bovingdon）、捷尔吉·卡拉（György Kara）、鲁斯·梅泽夫（Ruth Meserve）、根敦·饶赛（Gedun Rabsal）、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和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在此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沃克（Chris Walker）教授，他为我们规范文中的藏文提供了亟需的帮助。当然，所有的错误和遗漏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因标题“北方若干君主之王统叙记”而为人熟知的这件古藏文写本是一篇 8 世纪时期的文本。然而，相较于藏学界，这一文本在回鹘学界更富盛名。事实上，即使该文本是用古藏文书写，但其主体内容却与吐蕃几乎无关。文本内容更多是关于 8 世纪前后游牧于中亚北部地区与东亚地区的回鹘与其他民族部落的。该文本包含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也记载了一些神话传说以及传闻逸事，因而称得上是史实与虚构的结合体。而历史与真实之间模糊的边界，本就是引发一系列耐人寻味问题的因素之一。这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就包括谁要求创作了这一文本？该文本最初何时编成？该文本最先被创作出来时使用的是藏文还是另一种不同的语言，如果是使用另一种语言创作的，那么它又是为什么，通过何种方式被翻译成藏文的呢？我们审视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文本本身予以概述。

《北方若干君主之王统叙记》这个题名指的是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Paris) 伯希和古藏文收集品 (the Pelliot Tibétain collection) 中一小件不完整的文献。该文献是编号为 Pt.1283 的更大写本中的一部分内容。这份写本是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年) 1908 年在中亚考察活动中获得的。写本是卷轴形式，并且它与敦煌发现的其他写本相同，双面都写有文字。其中一面是汉文书写的佛经，但另一面是藏文书写的两个文本，两个文本的藏文字体相同。其中文本 I 相对更长一些，内容是一位年长的僧人与一位新出家僧人的对话，这个文本可能被用于训导；文本 II 即本文所研究的内容¹。

该写本曾两次影印出版，第一次作为巴考 (Jacques Bacot) 译本² 的附录发表；第二次由今枝由郎 (Imaeda Yoshiro) 和斯巴尼安 (Ariane Spanien) 公布³，本文即参考此次公布的照片。上述 Pt.1283 中短的文本 II 仅 110 行，最后 8 行即第 103-110 行的内容已经残破。文本的古藏文书写给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乍一看，对于习惯于清晰方正的鸟坚体藏文的读者而言，这份写本几乎不可识读，这也导致了文本识读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而这种情况也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

这份写本的内容是个行程记录的描述，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短小的途经中亚、北亚以及东亚的行程记录。这些行程记录涉及多处古突厥人的聚居地，因此这件写本对

1 参见 Lalou 1961: 1. 译注：该件文书 (Pt.1283) 现已在中国出版，收录于金雅声、郭恩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40-368，该书中将这两件古藏文写本分别命名为《兄弟礼仪问答》和《北方若干君主之王统叙记文书》。

2 Bacot 1956.

3 Imaeda, Yoshiro and Ariane Spanien 1979: plates 544-549.

古突厥学者而言是一份重要史料。但由于大部分古突厥学家不熟悉藏文，他们对于这则史料的使用就会受限于巴考的译文。这份译文在诸多问题的处理上并不十分正确，但又未承认藏文识读存在不确定之处。本文旨在提供一份新的英译文，同时，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注出存在问题的译文段落和存在争议的识读，以及相关学者的不同解读。做这样的工作是希望能够为学者们对该写本的识读、释读存在问题之处开展全新研究提供可能性，或对该写本中的难解段落提供一份新的释读。在开始对这份文书进行新的翻译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本的基本内容及迄今相关的学术研究作简要概述。

第二个标题说明出现在文本 II 第 4-6 行，黑色墨水书写，但在黑色之上有一圈红墨的痕迹，或许可译为：“先前，回鹘（匈奴）的可汗发布了一条政令，他派遣五位回鹘人前往调查在北方还有多少君王，〔这〕是从王室档案中取出的政令文书的抄本。”之所以被称为“标题说明”是因为它并没有表现出一个标题的形态特征：如它并没有写于文本的开头，也没有用较大的字体书写，并且它本身并不具备标题的简明性。不过，它确实提供了关于这个文本来源及其历史的大量重要信息。将其与现代人更为熟悉的标题形式相比，它更像是 18、19 世纪小说之中经常使用的副标题。

第二个标题提供了两个层次的信息：一是与伯希和所发现的 P.t.1283 这一特定写本文献相关；二是与这一写本所依托的原始文献出处相关。关于原始文献，标题中仅显示其中包括有回鹘可汗政令的文书。而这些政令显然包括派遣五位回鹘人前往调查在北方还有多少国王（以及大概多少王国）。而关于伯希和发现的 P.t.1283 号文书，其为藏于某档案室中原始文献的抄本的说法，很遗憾我们没能确证。尽管标题的内容如此宣称，我们手中的这一文本却没有包含这些政令的内容，但却包含了这些使者们的最终报告，这个报告似乎是在他们结束出使之后上报给可汗的。关于这一标题说明与我们手中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或可这样猜测，最初的报告很有可能被这份报告的收件人即回鹘可汗阅读过，用于战争或联盟，而最终被储藏在王室档案之中。附在这个最终的报告之后，也保存于王室档案之中的可能就是一些国王的政令文书。然而，或因为这些政令文书和这个报告分离了，或因为其他的一些未知原因，P.t.1283 的抄写员抄录了原文书标题，但却并没有抄录下整篇文书，略去了政令文书的内容，直接抄写这五位使者的报告。同时，抄写员也省略了五位使者各自行程的相关内容，这也就是如今我们在文本中找不到任何与这五位使者相关信息的原因。

关于这些标题的分析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沉重的问题，即语言问题。事实上，如果文书包含这五位回鹘使者向可汗所作的报告，那么为何它是用藏文书写而非用回鹘的语言呢？它是从回鹘语翻译成藏文的吗？或者直接就是用藏文书写的？为了试图去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确认一下回鹘（匈奴）。这个问题对于研究这份文本的所有学者而言都是一个难题，但为达目的，本文将聚焦于文本本身寻求证据。事实上，在文本 II 第 59-65 行，读者可以发现一则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的记述：

在那儿的北方有五姓拔悉密部族（婆离蜜）⁴，他们和回鹘（匈奴）以及葛禄（葛逻禄）一起组成了三方联盟。他们推翻了可汗即突厥汗王的统治。拔悉密的首领获得了可汗〔的称号〕，但是回鹘（匈奴）和葛禄（葛逻禄）杀死了拔悉密的可汗。拔悉密部族离散并成为奴隶。

以上即为对公元 742—744 年拔悉密（Basmil）、葛逻禄（Qarluq）和回鹘（Uighur）联盟击败并推翻后突厥可汗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记述。拔悉密的首领随后被推选为可汗，可是在此之后仅两年时间，这位推选的可汗就被联盟的另外两方势力回鹘与葛逻禄所击杀，这也导致了拔悉密部落的离散。此后不久，葛逻禄也败在回鹘手中，而回鹘最终也取代了后突厥汗国并掌控了它的领土⁴。

根据这一简明扼要的总结来看，似乎上文文本中出现的匈奴部落即可被认定为上述三方联盟中的回鹘。但是并不能肯定这份文本之中每一处提及的匈奴都是指代这三方联盟中的回鹘。单就本文研究而言，只需强调的是，因为匈奴肯定是回鹘部落中的成员，那么匈奴的语言自然是古突厥语的一种。之后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这份文本是用古藏文书写而非使用古突厥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有两个方面。事实上，通过考证 P.t.1283 号文书的来源及其所依托的母本，两个可能性答案就出现了。

就 P.t.1283 号文书本身而言，副标题告诉我们该文书是保存于王室档案中的底本的抄本。事实上这个抄本是抄自一个似乎被证明存在拼写错误的写本。这些错误很显然是一位抄写员所犯，这位抄写员面前有两份文件：一份文件是他正在抄写的，另一份是他抄写所依据的母本。在这位抄写员誊抄的过程之中，他犯了大量许多人容易犯的错误。实际上，因为上下文中一些句子的句首用词相同，他常常跳过一行或几行文字。另，由

⁴ 关于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详见 Beckwith 1987: 126; Chavannes 1942: 94; Golden 1992: 138, 158; Mackerras 1973: 8-9, 54.

于原文本之中常有相似内容重复出现，他就倾向于抄写自己已经写过的单词而并非参看原文誊抄。事实上，文中有一处他甚至重复抄写了一个分句而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即他在本应该放置谓语动词的地方插入了这个重复抄写的分句。

关于 P.t.1283 的母本，亦即原始底本所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知晓，由回鹘人留下的传到我们手中的写本一般由三种文字写成：源于阿拉米语—古叙利亚文字（Aramaic-Syriac）的粟特文、古突厥鲁尼文（the runiform alphabet）和藏文⁵。但是回鹘人也经常用藏文书写文书。当时藏文是被用于抄写佛经的一种神圣语言，或者像乌瑞（Géza Uray）论证的那样，是吐蕃王朝时期以及吐蕃衰落后 10 世纪期间用于行政文书的一种“官方语言”⁶。

很有可能这份文书的母本是直接用藏文书写的。不过，传至我们手中的大部分用藏文书写的回鹘文书都是佛教文献，因此，这份文书可能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情况下的一个例外。此外，如果我们接受该文本的母本是用藏文书写的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谁写了这份母本。事实上，如果它是一名回鹘人写的话，通过阅读标题，（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回鹘这一名称在文本中被用数种不同的方式拼写⁷。我们如何去解释一个回鹘人不知道如何拼写自己的部落名称？因而合理的解释就是，创作这份母本文书的人并非是回鹘人，而是一位吐蕃人。

那么，顺着这一思路，很有可能，在文书所记载的内容被从回鹘语（古突厥语）译为藏文之后，一位吐蕃人就用藏文创作了 P.t.1283 所依托的母本。对于这一翻译而言，只有两种途径是可能的：译自书面文献，或译自口述交流。在第一种情况下，或可这样假定，即吐蕃人将一份古突厥语文书译成了藏文，可能是在文书的发现地敦煌，这一地区在 787—848 年间由吐蕃控制。不过，如果这一假设正确，诸多不止一次被提及的族称，如回鹘、契丹（Khitan）、黠戛斯（Kirghiz）的写法就应该是统一的。事实上，“回鹘”这一名称出现了四次，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拼写，并且契丹和黠戛斯的族称也在区区数行中有着不同的拼写⁸。

将上述族称的不同拼写简单地归因为拼写错误，这一观点或许会受到反对。然而，

5 关于这一点详见 Golden 1992: 173; Kara 1996: 537.

6 参见 Uray 1981: 90.

7 第 25 行：楚比斯；第 26 行：楚楚斯；第 29 和 88 行：楚楚斯。纵观全文，上述这三个族称似乎被缩写为楚（第 4、5、36、37、44、45、47、60、61、90 行）。但是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楚并非是楚楚斯/楚楚斯/楚比斯的缩写，而是代表另一个独立的族群。详见 Moriyasu 1977: 34-46.

8 契丹的族称出现在第 27 行，先是拼写为契丹，后又拼写为契丹；黠戛斯的族称在第 46 行拼写为黠戛斯，第 47 行拼写为黠戛斯，第 55 行拼写为黠戛斯。

在我看来，这反而反映出抄写员或作者尝试将外来发音转变为藏文的困难程度。我认为，每当藏文母本的书写者尝试书写一个外来词时，他都尽可能地还原他耳朵所听到的外来词的发音。这一点似乎指向这一文本来源于口述的可能性。

如果 Pt.1283 的译本来源于口述，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份回鹘的情报成果，是如何到达吐蕃人手中的呢？有这样一种假设，即文本中提及的五位回鹘人可能曾被吐蕃所俘虏，吐蕃人将他们的描述直接翻译成藏文。然而，这一假想虽令人神往，但在很多方面都不切实际。事实上，很难想象吐蕃人能够将这五位士兵全部捕获，因为这五人走的是各自不同的行程路线，即这五人在他们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散的。最为理想的情况是，这五个人在一次聚会后被俘虏，但我们完全不能确定这五人曾经有过会晤⁹。尽管这一假想太过牵强，由于前文提及的抄写转录错误，似乎藏文母本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口述来源。藏文母本的产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当吐蕃人占领敦煌后，他们联系了一位曾听闻过这五位使者报告的回鹘人，而后写下了这位回鹘人的转述。

由上述三行副标题的内容所引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涉及回鹘可汗派遣使团外出原因等内容。这显然与该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息息相关。文书中发现的唯一时间段是上文所提及的 742—744 年，这显然代表的是一个很有用的时间上限 (*terminus post quem*)，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副标题中记述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段，亦即回鹘可汗发布命令的时间。事实上，政令文书可能是在回鹘可汗 744 年掌权不久之后颁布的，目的是明晰回鹘在击败拔悉密和葛逻禄之后周边哪些部落是友好的，哪些是敌对的¹⁰。副标题开头的时间副词“**एकू**”（一次）的使用可能就表明标题所记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744 年后不久——与被记述时间之间的间隔。这一事件被记述的时间，我暂时倾向于放在 8 世纪末，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¹¹。

既然该文本的几个基本时间参照已经给出，那么从细节上探讨这些使者的行程路线以及审视这些使者所提供的 8 世纪中叶左右居住于内亚地区的人口情况就有了可行性。文本中的行程记录提供了沿线居民的信息，提到了他们的名称、特征和习俗，还描述了他们所居地的气候和经济特征。文本没有用记述者的口吻，其记述内容也呈现出客观的形式：如文中使用“有一个”“有一些”等词语来记述，而不是采用回鹘使者的口吻如

9 这一假设首次由李盖蒂 (Louis Ligeti) 进行了考释并表示反对，详见 Ligeti 1971: 167.

10 李盖蒂并不认同这一假想，因为他认为回鹘的统治者已然对周边的状况十分熟悉，见 Ligeti 1971: 176。不过这并不能够排除在三方联盟破裂这样一个时间点下，这个使团被派出的可能性。

11 注意，巴考与李盖蒂都认为 **एकू** “曾经，有一次” 这一词语的使用是一篇寓言似的叙事的引进，详见 Bacot 1956: 140 和 Ligeti 1971: 169。

用人称代词“我”或是“他”等词来进行记述。这种客观的叙事体例表明，将这些事件向吐蕃人转述的那个人并不是这五位使者中的一员。讲述者只不过是一位熟悉五位使者报告内容的人，能够不带个人色彩进行客观讲述。

然而，即使是这五位参加了这些行程的回鹘使者，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亲身到访该文本所记载的所有地方和部族，而是在其行程中收集了相关信息。一般而言，某个部族越是被描述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使节就越可能没有真正到访过该族群。因此，在信息的接受者（即五名回鹘使者）与信息源（即任何一位曾告知某一部族信息的人，比如某位商人）之间，信息一定已经经过了多次传达。文本中与道听途说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一种标准的句式判断出，该句式为“并没有听闻〔那儿〕有人（*හි·අභිභාසුදායුණු*）”¹²。关于这些使者很可能没有亲自到访过的族群的记述，一定包括他们居住在“大荒漠山脉（*හු·ඩාඩු·දු·ක්කුදායුණු*）”之远的奇闻轶事，如巨人部落（第 50-59 行）、犬部落（第 70-84 行），以及野蛮的突厥人部落（第 94-110? 行），此外还有关于深色皮肤、头发蜷曲的人，以及像鱼儿一样生活在水里的人（第 19-20 行）。

正如克劳森（Gerard Clauson）已经注意到的，“大荒漠山脉”起到的是神话与现实边界的作用¹³。上述第一个例子中（第 50-59 行）记述，在这一山脉以远有一个巨人国，并在文本中记载了这些人的生活习性。在第二个例子中（第 68-84 行），文本记述了一个关于两名突厥士兵在大荒漠山脉中迷路，而后在一位年轻女人和一群狗的帮助下获救的复杂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和两条狗，这个故事似乎是关于古突厥人起源的神话，因为它和汉文史料中其他三则古突厥人的起源记载¹⁴相似。根据这一传说，此方土地的第一条狗来自上天，来到这里后他化身为一条黑色的狗与一条红色的狗，而后这两条狗开始寻找伴侣。第一次，他们找到了一头母狼，这头母狼被证明“不适合孕育子嗣（*හු·ඩාඩු*）”；于是他们从一个突厥人的村子绑架了一位年轻的突厥女孩儿，并和她孕育了后代。他们的孩子中男性全部是犬形，而女性全部是人形。这些后代形成了两大部落，一个被称作是赤犬部落，一个被称作为黑犬部落。这个传说，除了作为古突厥人起源神话的含意，必然还具有其他更深更广的含意，而这只有通过更深层次的学习研究才能够明确。我们所讨论的文本中的其他两则神话传说也是如此。

最后一群居于“大荒漠山脉”之远的神话族群是“野蛮的突厥人（*හුෂුලි·හි·ක්කුදායුණු*）”，

12 详见第 59 和 84 行。关于信息的传达，即 “par oui-dire”，参见 Ligeti 1971: 171-172。

13 详见 Clauson 1957: 13。

14 详见 Sinor 1982. 该文汉译文见：[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编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54-82。

他们与一则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故事相关，而这则神话讲述的是一位瘸腿男人的事迹（第 95-103 行）。在此，希望对这三则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所以被记载于这篇文本中的理由，在将来能够有更为详尽的研究。

这份文书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几乎没有提及过地域的名称¹⁵。每一道行程的精准路线并不总是有清晰记载，原因在于方位的描述总是使用一个大概的词语（诸如在……以远，在……之后，在……的另一边等），并且每一次行程新的出发点（译者注：或者称之为下一个目的地的地理位置参照物）总是不被提及。不过，由于一些部族名称得到识别，现代学者们已经努力着手重构其中的几条行程线路。

事实上，克劳森和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都尝试过复原文书中的行程线路，森安孝夫还依据从文本中获得的信息制作了相关地图。尽管如此，通过进行新的翻译，正如我已经完成的，加上运用一些近年来中亚民族史的学术成果¹⁶，仍然有机会贡献出对这些路线图及其中可能包含的民族历史的新理解，从而尝试对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并将文本中发现的一些含糊歧义信息置于更合适的背景之中。

巴考认为这个文本仅呈现了一条行程路线，很有可能是这五位回鹘使者同行。这条路线大致向东至朝鲜，而后向北和西北至贝加尔湖，最后向正西边至里海北边的大草原¹⁷。巴考并没有提及线路起点的问题，他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尝试回溯五位回鹘使者远行的出发日期，同时提供原文本的校订。巴考认为回鹘士兵的远行是源于回鹘可汗的愿望，这位回鹘可汗刚刚攻占了新的领地并将自己的人民安置于那儿，因而他想要了解他的北方邻居是谁¹⁸。符合这一点的最有可能的历史时期应为8世纪中期，即回鹘赶走后突厥汗国政权并定居于其领土——鄂尔浑地区(Orkho)这一时期。而这一记述的修订本或者说藏文译本则应出现于787—848年间，亦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巴考的译文发表仅一年后，古突厥学学者克劳森也就此发表文章。克劳森对于文本内容解读的主要进展是确定了奴萨可汗或为后突厥汗国的领域，该地作为五条截然不同的行程线路的起点，每条行程线路都由一位不同的使者记述。

克劳森认为这五条行程线路为：

(1) 从蒙古国向东至朝鲜, 向南到达太平洋海岸(第7-23行);

15 唯一的例外是 ଶିଦ୍ଧର / ସାମରଣ୍ୟାଭେଣ (第 7 行), ଶୁଣାଭେଣ / ଗୁଣ୍ୟାଭେଣ (第 15-16 行), ମନ୍ତ୍ରହ୍ରଦ (第 16 行)。

16 于此，我尤其指的是尤里·布吕格尔 (Yuri Bregel) 著《中亚历史地图集》中的地图 (Bregel 2003)，以及彼得·高登 (Peter Golden) 的著作《蒙古帝国前欧亚大陆操古突厥语民族与国家的形成》(Golden 2001)。

17 Bacot 1956: 137-138.

18 Bacot 1956: 139-140.

(2) 一则关于匈奴国西、北、东三面直接毗邻的地区的简要报告（第 23-31 行）；

(3) 一个部落名单，粗略地标明了其地理位置（第 31-59 行）；

(4) 居于匈奴北边的部落（第 59-84 行）；

(5) 居于匈奴西边的部落（第 84-110 行）。

然而，由克劳森提出的这五条路线的报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原文本中很难精确地区分从一份报告到另外一份报告之间的界限。如此，由克劳森提出的五条线路在文本中的记载不仅长度不等，而且部分重复。至于文本的校订等方面，克劳森认为这五位回鹘使者的报告是在第一任回鹘可汗在位时编写的，并且这份原文件也反映出可汗想要获得他的新邻国领域信息的意图。再者，克劳森认为如果这份文件是经由回鹘文译为藏文的话，那么，古突厥部族的名称将会更易理解。因此，他推测，该文献是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藏文的¹⁹。

克劳森的观点在李盖蒂 (Louis Ligeti) 1971 年的一篇论文中被全部重新讨论。由于李盖蒂自 1921 年起就已经通过巴考本人接触到了这份文本的研究，所以他有一个优势，即已经长时间了解了这份文本²⁰。在他的论文中，李盖蒂对巴考译文中某些段落的不足做出了评述²¹，同时也指出了克劳森提出的路线的一个主要不足，即这五条线路都是从匈奴出发的。正相反，在李盖蒂更为细致入微的解读中，只有第二条线路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条行程线路是从巴尔干开始的，这个地方似乎是回鹘人的城址，遗憾的是这个地点尚未能确定位于何处²²。此外，匈奴在其他的行程路线中也并未发挥核心作用。其他的行程路线似乎并非是从某一个中心点出发的，正相反，这些路线似乎只是从一个地点前往另外一个地点，且“这另一个地点”仅与其之前的那一地点相关，而与最初的出发点无关。

李盖蒂同样注意到这个文本之中个人因素的完全缺失，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即这五位使者从来没有到访过这个文本中提到的诸多国家与人群。并且，在李盖蒂看来，这五位使者向回鹘可汗上报他本已经非常熟悉的消息（诸如那些向回鹘进贡抑或是与回鹘处于战争之中的国家的信息，等等），这件事十分怪异。李盖蒂总结认为，这五位使者

19 Clauson 1957: 12-13.

20 Ligeti 1971: 166.

21 Ligeti 1971: 167-169.

22 伯希和曾将这一名字恢复为 Baqır Balıq，“铜之都”，但是其地理位置，我们尚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其对应的汉文名字巴陵尚未确认。这很遗憾，因为使用这个名字的地方似乎是五位回鹘使者的出发点。

不是回鹘人，并且这个文本的标题与副标题都是后来藏文文本的创作者附加上去的。然后他又提出，由于这个文本记述了匈奴（译者注：即古突厥诸族群）的传说，还提到那里的人群操匈奴语，但是却没有报告匈奴的相关内容，因而，这些使者以及他们的可汗应该是匈奴人²³。但李盖蒂并没有成功确认出匈奴²⁴的具体所指，他只是简单地总结认为，即使很显然匈奴被认定具备古突厥血统，该文本也并未指明匈奴具体是哪个族群或者地区。

最后一位对这一文本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森安孝夫²⁵。他认识到巴考最初译本的不足，将这份文本全部重译了一遍，并在巴考最初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视角。由于他的译文是日文，诸多学者并不能够运用这份学术成果，所以他们选择继续参考之前巴考开拓性的翻译。但巴考的译文是在这一领域的初期完成的，因此在许多方面都是初步的。

一方面森安孝夫认同李盖蒂提出的五条行程线路并非全部从匈奴出发的观点²⁶，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接受克劳森提出的关于五条行程路线的划分，他仅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即关于第二条与第三条行程路线的划分²⁷。森安孝夫文章的重点在于他反驳了巴考最初提出的将匈奴等同于回鹘人的观点。他认为匈奴这一名称决不能看做是匈奴/突厥/突厥/黠戛斯²⁸的简称，在这一文本之中，匈奴有时指的是蒙古高原地区的回鹘，另一些时候指的是东部天山地带、河西地区的回鹘。森安孝夫将文本中这种模棱两可的记载归因于该文本的藏文编订者的无知。

综上，学者们还没有就这一文本所提出的问题的解释以及可能的答案形成一致意见。关于文本中提及的部落和地区的令人信服、权威的地志文书尚未研究出来，这份文书的誊抄，它的语言、母本等等问题都有待解答。本文将展现这些问题中扼要的、精选的部分：行程路线；谁下令完成的这份文书；文书是在什么时候誊抄校订的；这份文本为何以及如何被译为藏文。对以上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从对这份文本新的、基于原文的翻译出发。辅助研究应该是补充寻找同一时期其他文本中相对应的部分，这可能会帮助提供这一文本中所述情况额外的一些细节信息。总之，在该文本以一种西方语言发表 50 年以后，仍然有许多挑战。巴考于 1956 年所表达的希冀在此也需要

23 Ligeti 1971: 177.

24 Ligeti 1971: 172-176.

25 参见前引 Moriyasu 1977 以及 Moriyasu 1980: 171-184.

26 Moriyasu 1980: 172.

27 森安孝夫提出第二则与第三则报告之间的休止停顿行发现于第 35 行，而并非是在第 31 行，参见 Moriyasu 1980: 174.

28 特别参见 Moriyasu 1977.

重新言及：该文本的翻译呼吁不同学科的所有学者、专家贡献其学识，以解决该写本所呈现出的问题。

藏文文本的注释和一些符号索引

在写本中，当词素处于行末时，音节隔离符号“·”并不经常出现在一个词素末尾。为了尽可能地遵循原文本，当原文本中没有使用音节隔离符号“·”时我也不再添加。事实上，因为这些省略多出现在行末，所以并不会导致误读。

- <ཀ·ཀ·ཀ> 原文本中省略的但辑录者添加的字母；
[ཀ·ཀ·ཀ] 原字母难以辨识或消失不见，辑录者添加的字母；
[ཀ·ཀ·ཀ?] 存疑的识读；
[...] 难以辨识的字母，字数不清；
[___] 难以辨识的字母，字数清晰；
[±3] 难以辨识的字母，字母数量大致清晰，用数字加“±”符号表示数量；
} ཀ·ཀ·ཀ 由于文本的物理损坏，文本内容自一行的中间位置开始；
ཀ·ཀ·ཀ { 由于文本的物理损坏，文本内容在一行的中间位置结束。

P.t.1293 之文本 II 《北方若干君主之王统叙记》录文²⁹：

1 ˜1 རྒྱନྰྩ୍ଶେଣ୍ଣା କୁୟା ମୁଁ ରୁଣା ମଦି ଶ³⁰
ରୁଣା ଶ୍ରୀ ପିଣି
˜1.1 ଶବ୍ଦ
˜1.1 ଶବ୍ଦ । କିର୍ତ୍ତନ ଶ୍ରୀ କୁୟା ମୁଁ । ରୁଣା ମଦି । । ରୁଣ୍ଣେଣ୍ଣା କୁ
5 କୁୟା ମୁଁ ମକିଣା ମଦି । କିର୍ତ୍ତନ ଶ୍ରୀ କୁୟା ମୁଁ ମଦି ରୁଣା ମଦି ।
ଶ୍ରୀ ପିଣି କିର୍ତ୍ତନ ଶ୍ରୀ କୁୟା ମୁଁ ମକିଣା ମଦି ରୁଣା ମଦି ।³¹
˜1.1 ଶବ୍ଦ । ଶ୍ରୀ କିର୍ତ୍ତନ ଶ୍ରୀ କୁୟା ମୁଁ ମକିଣା ମଦି । । ରୁଣା ମଦି । । ରୁଣା ମଦି ।
ରୁଣା ମଦି । । ରୁଣା ମଦି । । ରୁଣା ମଦି । ।

29 该录文为作者原文中所有，译者参考《法藏敦煌藏文文献》⑪（2010：355-359）中的影印原件进行了核校，录文前的行号为作者和译者所加，对应的译文前面也加了行号，以方便阅读。

30 ରୁଣା ମଦି 后面的 ରୁ 被删除。

31 ପିଣି 后面的 ପି 被删除。

କୁପ୍ରାଦ୍ୟ-ବ୍ୟାକ୍-କ୍ଷେତ୍ର-ଜ୍ଞାନିକୀୟ | ୦ କୁପ୍ରାଦ୍ୟ-କ୍ଷେତ୍ରାଜ୍ୟ-ବ୍ୟାକ୍-କ୍ଷେତ୍ରାଜ୍ୟିକୀୟ | ୩୨

33 例句：前面的句被删除。

34 ⑤ 前面的 𠂔 被删除。

35 55. 前面的 55. 被删除。

36 5. 前面有字被删除。

37 𩶻 𩶻 前面有字被删除。𩶻 𩶻 前面有字被删除。

38 55. 前面有字被删除。

39 𩫱. 上面有字被删除。

40 តិន្ទុស 之前有一个字被删除；ស៊ុណ 之后有两个字被删除。

41 空格后面一个词被删除。

42 前面的 \langle 被删除。

43 前面一个字母被删除。

44 དེ་ མེད· བେད· 前面的 བେད· 被删除。

46 5. 后面一个字母被删除。

47 55. 前面一个字母被删除。

48 翁·后面一个字母被删除。

49 而是应被删除的，但没有删除符号。

51 དྲྙྰ· 后面的 དྲྙ 被删除; གྲྙ· 前面的字母被删除。

译文：

(1) 居于北方若干君主之王统叙记⁵²。

(4) 先前, 𩵠⁵³的可汗发布了一条政令, 派遣五位𩵠人前往调查在北方还有多少位王, [这]是从王家档案⁵⁴中取出的政令文书的抄本⁵⁵。

(7) 在一个汉语名为𩵠·[𩵠?]⁵⁶, 突厥语名称为 باقىرىق (Baqır

-
- 52 藏文单词 རྒྱ ། 通常被译为“血统”“世系”，因为在古典藏语中，这个单词经常在诸如 རྒྱ ། རྒྱ ། (“王室谱系”“王室血统”)这样的复合词中找见。然而，正如 Ligeti 1971: 167 中已经提及的那样，即使是对这一写本快速浏览一下也能获悉其主题并非是居住在北方诸可汗的血统或谱系。因而，对 རྒྱ 一词及其上下文内容更为深入的解释是很有必要的。查阅耶斯克的《藏英词典》第 524 页可知 (Jaeschke 1998)，ରୂପାୟ 主要有三个含义 (1) 谱系，家族世系，种族，家族；(2) 世代，一代人；(3) 系列，连续，发展。这三个含义的共同特征似乎是一连串、一系列事物，或在时间概念上 (诸如“一代人”“家族”时)，或在空间概念上。因而，ରୂପାୟ 一词在本文本或可译为“系列”“连续”的可汗——以及王国——在空间概念上。另一种可能性是遵循石泰安 (R. A. Stein) 的观点，将 རྒྱ 译作“叙述”，参见 Stein 1988: 46。如此，那么 རྒྱ ། རྒྱ ། 便会有点冗余，译为“关于记述的文本”或是“关于叙述的文本”。
- 53 该文本中，𩵠 肯定指的是一个回鹘部落。这一点在文本的第 59-63 行中尤为清晰。这几行的记载表明至少在这一段文字中，𩵠 是指 745 年创建回鹘王国的回鹘人。不确定的是，是否文本中出现的所有 𩵠 (Ligeti 1971: 176 所列) 都指代回鹘王国时期的回鹘人或是指代该王国崩溃后迁徙的回鹘部族。如果文本中所有的 𩵠 指代的是回鹘王国，那么这种判断将会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五位战士的使团是在王国建立之后便被迅速派出，目的是在动荡的政变之后确认谁是同盟者，谁是敌人。或者，可以推测 𩵠 一词仅在文本的第 59-63 行这一位置指代的是回鹘王国，在其他情况下，当文本罗列出 𩵠 的同盟者和敌对者时，𩵠 指代的是回鹘王国崩溃后由另一个不同的回鹘部族组成的部落。另见本文前文介绍中关于 𩵠 含义解释的讨论。
- 54 རྒྱ ། རྒྱ 的含义并非是在字典中找见的，而是由朱塞佩·图齐 (Giuseppe Tucci) 在其著作《吐蕃赞普的陵墓》中创译为“档案馆”，见 Tucci 1950: 46, 82, n.94。这个词另见李方桂、柯蔚南的著作《古代藏文碑铭研究》，Li Fang Kuei and W. South Coblin 1987: 93-94。
- 55 རྒྱ ། 意为“典范，式样”“模型”“示例”，该词也被用作复合词之中，意为“抄写副本”，如 རྒྱ ། རྒྱ “书本”，ଆର୍ଦ୍ରା “原本”和 ରୂପାୟ “抄本、副本” (字面意思是“母本”和“子本”)。
- 56 巴考读作 ରୂପାୟ，但没有尝试去确认这一地点 (Bacot 1956: 141, 145)。李盖蒂 (Ligeti 1971: 177) 只是简单地提到汉语名称 ରୂପାୟ 仍未破译。根据白桂思 (Christopher Beckwith) 的意见 (私人交流)，更近距离的古文字学的检视表明，ରୂପାୟ 中的 ରୂ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文本中其他地方出现的 ରୂ。特别是其中的 ରୂ 在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向上的“尾巴”，这一特征在文本中其他 ରୂ 的书写中并没有出现。白桂思认为这个尾巴是字母 ରୂ 加了下加字 ରୂ，这样构成的词应释读作 ରୂ ରୂ 而不是 ରୂ ରୂ。现下确定，这个特殊单词中 ରୂ 的写法与文本其他地方的写法不同。不过，再对文本中出现的所有复合词 ରୂ 进行古文字学的详细考察后，我并未发现有着同样“尾巴”出现的例子。因而，似乎有可能，在这一情况下，ରୂ / ରୂ 的尾巴表示文书的抄写员试图去纠正一个错误。事实上，从写本上来看，似乎一个字母被写在另外一个字母上面，尽管可能推断后写的字母是最初打算书写的，但最终的情况是识读不清。同样的，一个汉语名叫 ରୂ ରୂ 的城市也没有确定。目前，ରୂ / ରୂ 与其对应的可能的汉语名称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Balīq)⁵⁷ 的国家的对面是十二个突厥人 **𐰚ۇڭ** (Bük čur)⁵⁸ [的] 部族：

(9) 国王夏玛 (شاھ) 可汗的部落一族⁵⁹; ڭۈچى 一族⁶⁰; ۋەنچى 一族⁶¹; ۋەنچى 一族⁶²; ۋەنچى 一族⁶³; ۋەنچى 一族⁶⁴; ۋەنچى 一族⁶⁵; ۋەنچى 一族⁶⁶; (11) ۋەنچى 一族⁶⁷, ۋەنچى

57 这一名称已经被伯希和重新释读为 *Baqīr Balīq, “铜之都” (Bacot 1956: 151), 但是其具体位置尚未求实, 或许是由于其对应的汉语名称尚未确认 (Clauson 1957: 12-13)。赛格列迪认为 (Czeglédy 1958: 28-32), 阿拉伯文 *Madīnatū s-sufrīya* (铜都), 波斯文 *Rōyīn dīz* (铜城堡) 是突厥语 *Baqīr Balīq* 的翻译, 并且代表着波斯的史诗英雄阿芙拉西亚普 (Afrāsiyāb) 之都, 根据不同的传统, 该城市的位置或在波斯的某个地方, 或在布哈拉 (Bukhara) 附近。上述的这两个定位对于该文本中记述的位置而言太偏西了, 这很令人遗憾, 因为 ۋەنچى / ۋەنچى 被确认为回鹘人的一个城市或某个地区 (赛格列迪认为是其首府) 的名字。关于 *Baqīr Balīq, 还可参见丹尼斯·塞诺的《近世内亚冶金史漫谈》(Sinor 2002: 308-309)。

58 这一名称似乎指的是后突厥汗国, 这一点在第 59-63 行历史片段的记述中很清楚。不过, 与 ڭۈچى 类似, 这一名称或许也指代后突厥汗国的残余部落。尤其是, ڭۈچى 似乎是突厥语 *Bük čur* 的藏文转写, (当代汉语普通话为“默啜”), 其似乎是后突厥可汗的名号, 他于 691-716 年在位, 称之为阿波干可汗 (Qapağan qagan, 关于此人的研究请参见 Golden 1992: 137 以及 Beckwith 1987: 58, n. 23 及该著作的其他各处)。ڭۈچى 与默啜的对应, 首先是由伯希和在对巴考译文附录的注释中提出来的 (Bacot 1956: 15)。克劳森 (Clauson 1957: 12) 认为后突厥汗国的核心地带位于哈拉巴拉卡逊 (Qarabalgasun) 附近, 鄂尔浑河河畔。李盖蒂 (Ligeti 1971: 17) 认为正相反, ڭۈچى 绝不可能指代后突厥汗国。据托马斯 (F.W. Thomas) 对包含一个传奇故事的一件藏文残件的研究, ڭۈچى 一定指的是甘肃西部地区, 罗布泊附近。这一看法认为第 59-63 行的段落不重要, 因为李盖蒂认为该段内容所处时期距离文本成文时间相距太远。关于 ڭۈچى 是一个地理名词还是一个政治名词, 丹尼斯·塞诺在其论文《古突厥文明的若干构成要素 (6—8 世纪)》中对许多假设进行了总结, 见 Sinor 1985: 152-153。

59 参见上述的校正本。校正本中 ۋەنچى 已经被订正为 ۋەنچى。事实上, 后者作为 ڭۈچى 突厥汗国可汗出现了两次 (第 49-50 行及 69-70 行)。这一抄写错误在克劳森文中也被确认了 (Clauson 1957: 13)。

60 克劳森 (Clauson 1957: 18) 尝试将 ڭۈچى 这一名称重建为汉文史料中发现的后突厥汗国的可汗颉利 (Hsieh li, 620—634 年), 关于这位可汗的研究参见 Golden 1992: 133-134。

61 高登 (Golden 1957: 18) 假设这个名称或许应该读作阿史德, 噩欲谷 (Toñuquq) 的族姓。噩欲谷是 682—691 年后突厥汗国颉利施可汗 (Elteriš qaghan) 的丞相。关于噩欲谷的研究参见 Golden 1992: 137-138。

62 克劳森 (Clauson 1957: 18) 建议从汉语层面重新识读这一名称, 但是距一个清晰的定论还远远不够。

63 伯希和将 ۋەنچى 重新识读为 ۋەنچى (奴隶), 8 世纪时期后突厥汗国时期的一个部族 (Bacot 1956: 15)。关于 ۋەنچى 的研究参见 Chavannes 1942: 32, 96 以及 Beckwith 1987: 150。

64 克劳森 (Clauson 1957: 18) 建议从汉语层面重新识读这一名称, 但是距一个清晰的定论还远远不够。

65 相关信息不明。巴考误读为 ۋەنچى。

66 伯希和提出将这一名称比定为古突厥的 ۋەنچى (苏尼) 部族 (Bacot 1956: 151)。

67 相关信息不明。

一族⁶⁸; ཇི་ན་པ་一族⁶⁹; ພາ·ຄັງ·ຫຸດ一族⁷⁰; 这些部族他们没有王⁷¹。他们有一支六千人的军队。

将视线投于这些部族以东, (13) 藏文叫做 ཉ, 汉文叫做 ཉ·ཅེ [及] 突厥文叫做 དຕ·ບັບ (Tatabi)⁷² 的部族, [他们的] 首领是钟瓮牙 (ຫົດ·ສັນຍາ), 这一部族用金银配饰他们符合要求的祖先们的头骨并 (15) 把 [它们] 制成饮酒 (字面上: 麦酒) 的容器⁷³。

从那儿向东望去, 在高丽 (高丽)⁷⁴ 的方向上, 在山东 (山东)⁷⁵ 督军 (督军) 张忠志 (张忠志) 的辖地上, 突厥文叫做 ສູນ·ເມີນ⁷⁶, 汉文叫做 ສູນ·ເມີນ, (17) 这一部族将 [他们的] 下颌贴着胸部。他们食人肉。他们将年迈的父母及 [其

68 相关信息不明。

69 这一部族与嚙哒人 (the Hepthalites) 有着直接的联系 (和拜占庭 *Ἄβδλατι* 类似)。嚙哒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 在公元 6 世纪初控制着内亚大部分地区。该政权在 557 年被古突厥人—萨珊人的联盟摧毁了。这儿提及的 ཇི་ན་པ་ 并不一定是旧王朝的残余部分, 更有可能仅仅是指和一个更为著名的部落联盟名称相同的部族。

70 相关信息不明。

71 这一句非常模棱两可, 由于 དຕ·ບັບ “他们” 这个词的使用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所有被提及的部族还是部分, 抑或仅仅是最后的几个部族没有王。不过, 这些部族中至少有一个一定有一位王的。事实上, 第一个部族的名称并非是一个合适的族称, 而是和这一部族的国王夏玛 (Zha ma) 可汗相关。文本中同样模糊不清的还有, 哪个部族拥有六千军队? 这个数字是代表所有十二个 ສູນ·ເມີນ 部族合在一起的武装力量吗?

72 克劳森和李盖蒂已经将 དຕ·ບັບ 这一部族比定为 Tatabi, 详见 Clauson 1957: 19 和 Ligeti 1971: 186, n.70 (译者注: 该族称在学术界一般有两种看法, 其一即认为该族称指的是奚人, 其二即认为该族称为地豆于的对译), 即在这一时期居于朝鲜以北操蒙古语的一个部族。关于 Tatabi 这一部族的研究参见 Golden 1992: 145, 184。

73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大约 500 年后, 波德诺内 (Pordenone) 的奥多里克修士 (Friar Odoric) 讲述了一个类似的习俗, 修士记载的习俗与西藏相关: “在这一地区他们有着另外一种风俗, 如下。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死去, 那么这个人就会说 ‘我愿意对我父亲的回忆表示敬意’; 之后他请来这一地区周边所有的祭司、僧侣以及乐师和所有的亲属邻居。他们高高兴兴地将尸身抬进村子, 他们准备好一张大台子, 祭司们在台子上把尸身的首级砍下来, 递给死者的儿子。……为此, 他取来其父的头颅, 径直煮了吃掉, 并且用头盖骨制成饮酒器皿。他及其家人总是虔诚地从头盖骨碗中汲取其父的记忆。”参见 Yule 1965: 251-254。

74 第 15 行的 ສູນ·ເມີນ 和第 16 行的 ສູນ·ເມີນ 都是汉文高丽、或高句丽 (Koguryo) 的转写。这一部族在当今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其所在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朝鲜及中国东北。

75 这里显然指的是山东。山东在此处被用来指示文本正在讨论的区域的大致方向。

76 ສູນ·ເມີນ 这一名称对应鄂尔浑碑铭上的突厥语 *Bükli*。这一名称同样以 *Movkpi* 的形式出现在拜占庭的文本之中。这一名称被认定为是渤海国, 位于朝鲜北部与满洲东部之间, 参见 Clauson 1957: 19-20; Ligeti 1971: 186, n.72; Moriyasu 1980: 175-176。关于 *Bükli* 与 *Movkpi* 之间的对应关系, 参见 Moravcsik 1983: 193。感谢艾骛德 (Christopher Atwood) 教授推荐此书目。

他的]老人赤裸⁷⁷着扔出而后杀掉他们。

从那儿向东望去，是被称为百济(ပေါ်ခဲ့, Paekche)的南方人⁷⁸，(19)他们赤身裸体外出活动。

从那儿望向南方，有一群人像鱼一样生活在水里面。

从那儿望向南方，(有)一群黑色的南方人，(他们有)白色的眼睛以及像海马一样蜷曲的头发(21)，他们就像鱼儿一样擅长游泳⁷⁹。

将视线放在တုတ္ထ(Tatabī)的北方，有一个部族叫做တုန္တာ，他们用鱼骨头制作[他们的]帐篷支架，[至于他们的]帐篷顶部，上层人(23)用鱼皮制作，[而]底层人用白桦树皮制作。

从တုန္တာက်，藏文叫做တုန္တာနားတူ(“九骨”)⁸⁰的突厥人九个部族的大首领，向西⁸²望去，(25)回鹘(ဥမ္မာရ်)的军事首领⁸³，已经获得可汗(ရာရာ)的称号)，由中原王朝授予⁸⁴。至于可汗的家族(တူ，字面义“骨头”)，叫做ယရာပဲ·

77 ՚န္တာ这一词语的含义尚不确定，这一短句的含义将会因为这个词语的翻译而改变。巴考也将之译为“赤裸的”。我只在南杰次仁的《古藏文词典》(Rnam rgyal Tshe ring 2001: 34)中发现过这一含义。在耶什克所编词典中(Jaeschke 1998: 26)，其他相关的条目有՚န္တာ“野山羊”，这引出了一种译文，即老人们像野山羊那样被聚集追杀掉的(残忍)描述；՚န္တားရ်“贷款”，这一翻译给出的译文是：“他们将他们年迈的父母和[其他的]老人当做贷款(即赎金?)并杀了他们。”尽管这一翻译具有诱导性，但它展现的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如果他们部落的老人被作为赎金送给(一个敌对势力)，这些老人又为何会被高丽自己人杀死呢？因而，我更倾向于将՚န္တာ译为“赤裸的”。不过请注意，在文本的第18-19行，՚န္တာ被译为“赤裸的”。

78 ՚နာ是位于吐蕃南部小邦的总称，因此՚နာ字面上意为“南方人”。ပေါ်ခဲ့对应的汉文名称是百济，由此，文本此处论及的区域是朝鲜半岛的东南角。

79 如果՚နာ被译为“南方人”，这可能是对土著人的一种描述，深色皮肤，头发蜷曲(阿伊努人被认为是这群人中的一部分)。

80 目前相关信息不明。克劳森(Clauson 1957: 20)和森安孝夫(Moriyasu 1980: 176)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此处记载的人是北太平洋地区附近地区流域的民族，这片区域可见北方针叶林中常见的桦树，并且这片地域可猎杀鲸鱼，鲸鱼的皮肤和骨头可能能够像上述描述的那种方式被使用。

81 藏文为တုန္တာနားတူ，这一词组确信是突厥语词汇 *Toquz Oghuz* (译者注：即九姓乌古斯，或称托古斯乌古斯)的藏文翻译。赛格列迪在《论古突厥部族联盟的构成》一文中认为(Czeglédy 1972: 276-277)，这九部(toquz oghuz)的部族联盟事实上包括十八个部族，即八个乌古斯部族和一个回鹘部族，回鹘部族又分为九个次一级的部族(译者注：此处语意应为回鹘共有十个部族)。另参见Golden 1992: 156：“九姓乌古斯联盟由占统治地位的回鹘和其他八个部族组成，回鹘部族又由十个部族/氏族构成。”关于九姓乌古斯的研究请参见蒲立本：《关于九姓乌古斯问题的几个看法》(Pulleyblank 1956: 35-42)和哈密顿：《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Hamilton 1962: 23-63)。

82 注意တူ译为“西”。在最古老的古藏文写本中，如《吐蕃大事纪年》，“西”对应的一直都是՚နု。因此，此处တူ一词的使用可能表明这个文本的年代相对较晚。

83 藏文՚န္တားရ်，突厥文 *totoq/tutuq*：“军事首领”。

84 字面义：“通过在藏文中被称为九姓的那些部族的大首领，回鹘的军事首领，由中原王朝认可[并且]由中原王朝授予的可汗这一[称号]，被获得了。”

那⁸⁵;至于[它的]追随者⁸⁶,这一家族带有九个项饰⁸⁷,并且回鹘(乞⁸⁸厥⁸⁹)部族单独就有军队六千人。

(27) 从这儿望向北方，是一群叫做契丹(契丹)的人，国王，契丹(契丹)⁸⁸的可汗(可汗)，他的食物和宗教都和吐谷浑(吐谷浑)⁸⁹的相似。至于家畜，小牛、羊以及马是很常见的。(29) 他们的语言也大体与吐谷浑相同。他们有时与回鹘(回鹘)争战，有时又是朋友。

从那儿向东望去，即 དຕ་པཷ (Tatabi)。

在那儿的北方，有一个 **શાસ્ત્રીયિક**⁹⁰ 的部族，[他们的] 国家，[在] 山谷中，
(31) 家畜仅有猪。

西藏⁹¹这一部落所在的国家出产极好的药蜜⁹²。有五个部族用桦树皮来制作〔他们的〕帐篷顶。

从那儿向北望去, (33) 在一望无尽的湖畔, [那儿的] 人们, 他们的居所和身体特征都与吐谷浑相似。家畜有多种。至于服饰, [他们] 穿着皮毛衣(匈奴语, 字面义: 毛皮)。在冬日, 在广袤的平原上, 大地开裂, 人们 (35) 不能到处走动。这个大部族是很幸福的⁹³。

85 此即药逻葛 (Yaghlaqar)，回鹘的王族姓氏。参见 Clauson 1957: 20; Golden 1992: 156; Ligeti 1971: 180。

86 藏文^新可能是^新（“集团，圈子”，“追随者”）的讹误。“集团、圈子”同样也在^新的含义之中。由于巴考将^新与^新都解释为“集团、圈子”，所以巴考的译文是：“他建立了九个等级”（Bacot 1956: 145）。关于^新这一词的含义参见下一个注释。

87 Jaeschke 1998: 205 将 *Spitze* 译为“任何事物的顶部，一个顶饰”（他的大风格）。这些可能是权贵们的纽扣或者装饰物。

88 契丹 / ケーハン 已经被认定为契丹 (Clouston 1957: 22; Moriyasu 1980: 176.)。关于契丹的起源参见 Golden 1992: 183-187. 这个名称的转写错误表明这个文本的来源是口语中。

89 阿柴（阿柴）是吐谷浑的藏文名称，吐谷浑是居于青海湖附近的操蒙古语的人种。关于阿柴 / 吐谷浑的研究参见 Molè 1970。

90 迄今相关信件不明确。这个名称似乎也是突厥语 (ئارا = *aara*; ۋىئىرۇ = ?)

迄今相关信息不明。

92 藏文：ସିଙ୍ଗ 在词典中只能查到ସିଙ୍ଗାର “药蜜”或“药草”

93 祈福的含义在现代与古代藏文中都是“幸福的，开心的”。然而，这个句子的意思令人迷惑，尤其是考虑到这一表达（*ସ୍ମିଦ୍-ଶ୍ରୀଦ୍-ବାଣୀ-ଶକ୍ତି*）在文本中不止出现了一次（见第 91 行）。在古藏文中 *ସ୍ମିଦ୍* 一词相较于现在有可能拥有一个不同的含义。这一点可从这样一件事中推导出来，即在这一句子中，*ସ୍ମିଦ୍* 后跟 *ଅଣ*，“一”，这可能意味着 *ସ୍ମିଦ୍* 并不具有一个抽象的意义。这一句子从字面上译为：“对这一部族来说有一件幸福的事”或是“这个部族有一件幸福的事”。

从那儿望向东北，是內^{シキ}⁹⁴部族。这一部族用桦树皮来制作帐篷顶。他们向^{シハ}提供青鼠的毛皮。

(37) 在那儿的北方，是^{シニ}⁹⁵七部族，他们没有王。他们一直在与^{シハ}战斗。[他们]用桦树皮来制作[他们的]帐篷。说起桦树，[他们]就像汲取母乳一样榨取其树浆(39)来酿酒。谈及这个山谷，它是坚固的⁹⁶。

看向那片[土地]的西方，有一^{シニ}⁹⁷小部族，他们使用牡鹿托运的稻草在群山中搭建自己的居所。说起[他们的]服饰，他们在冬天和在夏天的穿着是相似的：(41)他们衣着用黑炭摩擦过的野生猎物毛皮。至于食物，他们食用野生猎物的肉、小麦，^{シル}药草以及鼠粪(一样的食物)，(43)一种被老鼠储存起来的，以及被啄木鸟在老鼠数量增多时贮存于腐朽的深木里面的食物⁹⁸。他们向^{シハ}献上野兽的毛皮。

从那儿，(45)向西北望去，有一个^{シル}⁹⁹部族。这个国家很强大，且因为[他们]不听从^{シハ}的命令，[他们]不停地战斗。

在他们之后两个小的^{シル}部族；(47)他们有时与^{シハ}战斗，有时友好相处。在那儿北方有一个^{シル}部族。眼睛是水晶眼，头发是红色的[且]在他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家畜。马儿(49)生来高大¹⁰⁰。

94 巴考将^{シキ}比定为黠戛斯(Bacot 1956: 138)，克劳森持相同观点(Clauson 1957: 22)。克劳森认为的这个拼写相较于^{シル}(第46行)、^{シル}(第47行)以及^{シル}(第55行)等形式仅是一种不同的转写。这一点似乎可能性不大，已经被森安孝夫所驳斥(Moriyasu 1980: 178-179)，森安孝夫提出巴赞(Louis Bazin)的一条建议，其认为^{シキ}或许是克烈(Kherait)蒙古(<Kärägit)。

95 ^{シニ}具体所指尚未确定。克劳森认为他们肯定不是突厥人(Clauson 1957: 22)，他们可能是芬—乌戈尔语系(Finno-Ugric)或是通古斯语族(Tungusic)的。正相反，森安孝夫致力于^{シニ}、^{シキ}、^{シニ}、^{シル}与^{シハ}之间的关系研究(Moriyasu 1980: 177-179)，他认为^{シハ}就是位于蒙古高原的回鹘部族，^{シニ}(以及^{シキ})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北部，亦即贝加尔湖的东南部。

96 巴考译为：“这个国家很封闭”(Bacot 1956: 146)。这一句子出现不止一次(第45, 65, 67行)。^{シル}的意思是“强壮的”“非凡的”“有力量的”，或“坚固的”“安全的”。这个句子似乎传达了一种有关国家地形和军事实力的含意。少一些字面义，其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他们的领土享有[战略]优势地位”。

97 迄今相关信息不明。

98 这个相互关联的传闻可能是一个民间故事在这个文本中得以体现。^{シル}似乎是一个药草的名称(参见Rnam rgyal Tshe ring 2001: 400)同时^{シル}似乎等同于^{シル}，一种啄木鸟。

99 这一部族被李盖蒂比定为^{Küčügür}(Ligeti 1971: 184-185)，是《蒙古秘史》中提及的乃蛮部(Naiman)蒙古的一支。森安孝夫认为8世纪时乃蛮部占领了唐努乌拉山脉(Tannu-ula)地区(Moriyasu 1980: 177)。

100 ^{シル}和^{シル}这两个族称都是黠戛斯(Kirghiz)的语音转写。黠戛斯这一族名在文本中还以^{シル}的形式再次出现(第55行)。此处黠戛斯体貌特征的描述与汉文史料、伊斯兰史料中所见的体貌特征都不相似。事实上，黠戛斯可能是非突厥语部族，并且考古发现已经揭示其一些蒙古与欧洲的混合特征。关于黠戛斯族源的研究，参见Golden 1992: 176-183。

由此再往北方，被大荒漠山脉隔开；当夏玛（夏瑪）可汗¹⁰¹率领军队时，军队不能穿越〔它〕。在它〔山脉〕的另一边，在北方，(51)有一群人有着高大的身躯。他们的身高约有三寻（四寻）。〔他们的〕箭，¹⁰²武器与食物与其他国王的那些相似。在树敌方面，〔他们〕注意力并不放在后悔上¹⁰³，(53)并且死亡的人没有葬礼（葬礼）。如果一个人死去，〔他们〕不会举行葬礼也不会立坟塚。从孩子（不会说话）比划着交流起，〔他们〕就礼敬天神（天神）¹⁰⁴。家畜有诸多种类的小牛和羊。(55)〔至于〕¹⁰⁵尼扎·米施部族，当〔他们〕派遣出一名使者时，〔巨人们？〕说：“〔你〕就像这个：一只像孩童一样来盗窃的狗。”〔巨人们〕在他的（使者的）耳朵里放置（物品？）(57)并且将〔他〕绑上吊起来。〔他们〕问这个使者：“我们牛群羊群的牧民，叫做¹⁰⁶的这一家族现在居住在哪里？”¹⁰⁵至于巨人族的另一边，(59)并没有听闻那儿有居民。

101 克劳森认为¹⁰⁷夏玛应为后突厥汗国的最后一任可汗乌苏米施可汗（Özmiš qaghan），见 Clauson 1957: 13。

102 𠂇意为“平静”“安静”“平和”，所有的含义都不适合这里语境。我们或许可以假设𠂇是𠂇“四”的误写，但是随之产生的“四箭”这一意义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另一种可能性是𠂇的误写，其意为“基地”“基础”，也有“居所”“住所”和“所在地”“地方”之意。如若我们接受这一可能性，随之而来的译文就会是：“他们的箭，居所，(……)”。巴考将𠂇读作𠂇“太阳”，并把𠂇译为“暴露在阳光下”（Bacot 1956: 146），因此得出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翻译：“山谷的一侧暴露在阳光下，其武器与食物与其他国王的那些相似”。这一译文不可采信，首先因为此处的写法肯定不是𠂇而是𠂇，其次因为“山谷的一侧”在文本之中无处可寻。关于这一段，根敦·饶赛（Gedun Rabsal）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识读（口头交流），他认为¹⁰⁸“箭”应该被读作¹⁰⁹，是动词“成为”的敬语形式，此外𠂇应该被修正为𠂇，表动词的动名词形式的后缀。如此，¹⁰⁸将在句法上依附于句子的前一部分（“他们的身躯约有三英寻高”），与其他王的相似点的清单将仅包括武器与食物，因此会有如下译文：“他们的身躯约有三英寻高并且他们的武器与食物与其他王的那些相似。”但这样翻译可能会被批评，因为它对原文做了较多的更改。

103 也就是说，这些“巨人”并不感到懊悔，简而言之，他们报复心十足。

104 这一段文字似乎表明，在巨人之中，孩子一旦能够用示意的动作（即讲话）进行交流，他们就开始礼敬天神（天神）。事实上，藏文¹¹⁰“以上，上边”，被解释为“从现在开始，从这一点开始”。天神通常被译作“天神”或“神灵”，最好不译，或者，最多译为“超世俗的存在”。

105 这一句子是有问题的，因为动词总是没有主语。在一种情况下也有直接宾语缺失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什么被放进了耳朵中，我们或可假定是吊着这个人的某种物品（一种拷问的形式？）。理解这一句子的关键或许在于¹¹¹“被绑着和吊着”这一短语的识读，它是¹¹²“被绑着和被审问”的误读。这样解读的话，下面的翻译就可以确定了：“至于尼扎·米施部族，当他们派遣出一名使者时，〔巨人们？〕说：‘〔你〕就像这个：像孩童一样来盗窃的狗。’〔巨人们〕将〔他〕绑起来审问〔他〕，然后问这个使者(……)”。不过，遗憾的是，¹¹³中的𠂇的正确拼法并没有误读的可能性，因此¹¹⁴这一识读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是很牵强的。在巴考的译文中，他对这一有问题的段落保持缄默，只是简单地译为：“他把他绑起来准备吊死”，参见 Bacot 1956: 146, 150, note 22，他承认对¹¹⁵这一段搁置未翻译。

在那儿的北方有五姓拔悉密 (བླྙྩྲ) ¹⁰⁶ 部族，他们和 ཁྱ ། 以及 རྩྡྲྲ ། 一起组成了三方联盟。他们推翻了可汗即 རྩྡྲྲ ། 王的统治。(61) 拔悉密 (བླྙྩྲྲ) 的首领获得了可汗 [的称号]，但是 ཁྱ ། 和 རྩྡྲྲ ། 杀害拔悉密 (བླྙྩྲྲ) 的可汗。拔悉密 (བླྙྩྲྲ) 部族离散并 (63) 成为奴隶。拔悉密 (བླྙྩྲྲ) 的领土， གླྙྩྲ ། ¹⁰⁷ 的一族，拔悉密 (བླྙྩྲྲ) ¹⁰⁸ 的领土， རྩྡྲྲ ། ¹⁰⁹ 的一族， [曾有] གླྙྩྲ ། གླྙྩྲ ། ¹¹⁰ 这个首领； གླྙྩྲ ། ¹¹¹ 的一族， (65) [曾有] གླྙྩྲ ། གླྙྩྲ ། གླྙྩྲ ། 这个首领， [他们的] 国家是强大的，且葛逻禄 (ରୂପାଶାଳ) 并没有攻占过 [它]。

在那儿的北方， ཁྱ ། 部族并没有和任何人发生战争或是斗争。

在那的西方， (67) 约有十个部族 ¹¹³。一些 [拥有] 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些 [拥有] 美丽的山谷，其余的 [拥有] 一个美好的国家以及辽阔的草地。

在这些部族的北方，大荒漠山脉之外， (69) 有天王 (ରାଜାଶିରାମାର୍ଯ୍ୟ) ¹¹⁴ 二部族。 རྩྡྲྲ ། 的王，夏玛 (ଶାମ) 可汗统治时期曾经是和平的，当 [他] 往此方向行军时，军队不能越过且 (71) 两人走失。循着一头雌骆驼的足迹行进，随着足迹通向纯净的水源，他们在一群雌骆驼附近 (73) 偶遇了一个纯真的女子，并且，操突厥语，女子领着 [他们]，他们跟着 [她] 躲藏了起来。一群 (75) 正追着猎物的狗回来了，接着狗用鼻子感知到了他们，且 [他们] 拜倒

106 ཁྱ 即拔悉密部族。接下来的是对 742—744 年发生的事件的简述。关于拔悉密的研究，参见 Golden 1992: 142-143；Grousset 1991: 113。注意，拔悉密的名称的拼写总是不尽相同。这指向原文本的修订本是来源于口述。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想象，每次一个外文名称被说出时，藏文本的抄写员就会试图以一种尽可能接近他听到的发音的方式来录文。直到最后两次拔悉密这一名称被提及，这个抄写员似乎才决定了其发音的正确的拼写方式。

107 采纳了克劳森 (Clauzon 1957: 14) 的建议后，韩百诗 (Louis Hambis) 已经将这一文本中的 གླྙྩྲ ། 比定为 Kästim，成吉思汗击败的部族之一，参见 Hambis 1958: 313-320。

108 这可能是这一特定写本的抄写员所犯的一个错误而造成的“同上”抄写。似乎这句话的动词应该在这里 (可能是“被夺取”“被占领”)。另一种可能性是此处缺失的不是谓语动词而是这一部族首领的名称 (参见下文两行内容)，诸如：“他们的首领 (名号) irkin (俟斤)”。

109 这一名称被重构为鄂尔浑碑铭中的拔野古 (Bayırqu) (Bacot 1956: 152; Clauzon 1957: 14; Ligeti 1971: 186; Moriyasu 1980: 179)。高登确认这一部族的首领拥有俟斤的称号 (Golden 1992: 143)。他还认为：“他们的聚居地位于图拉河 (Tola river) 以北，回鹘以南，他们似乎与回鹘有所联系”。

110 Irkin 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部族首领的突厥语称号 (Golden 1992: 136)。巴考将这一首领名字识读为 གླྙྩྲ །。

111 高登对于 གླྙྩྲ ། 这一部族的认定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读 (Clauzon 1957: 14)，但没有任何一种看法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

112 迄今相关信息不明。

113 高登将这些部族认定为十箭部落 (On oq)，见 Clauzon 1957: 15。但森安孝夫认为他的假设不可接受，Moriyasu 1980: 180。

114 这似乎是 *tengri qaghan* (天可汗) 的藏文翻译。

在这群狗面前。于是，这群狗让十只母骆驼驮负他们穿越这片荒漠所需要的任何物品以及水资源，(77) 并且护送 [他们] 回去，他们到达了 (以及回归了) 古突厥人的国家。

最初的狗从天而降，其一分为二，一条赤色的狗和一条黑色的狗，并且，(79) 同时 [他们] 遇上了一只母狼且将其作为配偶 [与她] 交合，她却并不适合哺育后代。随后，[他们] 绑架了一名突厥部族羽翼下的未婚少女并与这个少女交合。说起男性后代，[他们] 以犬形降生。至于女性后代，(81) [他们] 以人形降生且外貌是纯净的女人 (亦即真正的女人)。谈及赤犬的部族，名叫 *قىزىل كۈشۈ*¹¹⁵。至于黑犬的部族，其名为 *قارا كۈشۈ*¹¹⁶，这些狗以及 (83) 这些女子操古突厥语¹¹⁷。至于 [他们的] 财物和食物，诸如牛，则由女子们将这些安置在一起并共同使用。在此地的另外一边，没有听闻有人居住。

望向此地的西方，(85) 有三个 *ئەرەن* 部族¹¹⁸。他们有八千军队。他们与 *ئۇڭىز*¹¹⁹ 和 *ئەڭەن*¹²⁰ 斗争。

望向那里的东方，有三个 *ئەنەن* 部族¹²¹，并且，(87) 看向大 *ئەنەن* 部族的方向，[他们] 献祭以寻找、召集通晓律法的 *ئەنەن* 贤者，他们与 *ئەنەن* 战斗¹²²。

115 字面义：“赤犬” (古突厥语: *qızıl küshü/küčük*)，参见 Ligeti 1971: 186。

116 字面义：“黑犬” (古突厥语: *qara küshü/küčük*)，参见 Ligeti 1971: 186。

117 有趣的是，500 年后修士德·伯瑞迪阿 (C. De Bridia) 在他的《鞑靼史》(*Historia Tartarorum*) 中记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相似的故事：“鞑靼 (Tartar) ……在沙漠中行进了一个多月后到达了犬族的领地，犬族的鞑靼语是 *Nochoy Kadzar*；因为 *nochoy* 是鞑靼语 ‘狗’ 的意思，*kadzar* 是鞑靼语 ‘土地’ 的意思。他们在那儿发现仅有女人而没有男人……。他们询问那些女人，男人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而后女人答道这里的男人天生就是犬形。”参见 Skelton R. A., Thomas E. Marston and George Painter 1965: 70。

118 在第 60 和 62 行，藏文 *ئەنەن* 译为葛逻禄。

119 即突骑施 (*Türgiš*)，其因和同盟吐蕃在 8 世纪时期给大食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这一事实而为人所知。730 年大食—大唐的联合军队击溃突骑施，又于 742 年击溃了突骑施的同盟者吐蕃。葛逻禄迁徙到了突骑施的故地。关于突骑施的研究，参见 Beckwith 1987，尤其第 3、4 章。

120 *ئەڭەن* 是中古波斯语，指阿拉伯语 *Tayy/Tadjik* 的藏文转写。该名称最初是众多阿拉伯部族中一部的名称，后来，拓展至指代整个阿拉伯部族。

121 高登认为这些部族是马赫穆德·喀什噶里 (Mahmud Kashgari, 11 世纪著名突厥学者) 所记载的 *Oghraq*，见 Clauson 1957: 15。

122 此处的形容词 *كۈچىك* (“大的”)，被加在 *ئەنەن* 这个名称上，这一组合指代的可能就是回鹘王国。尽管这一句似乎在暗示摩尼教存在于回鹘人 (不管此处所指是回鹘王国，抑或是森安孝夫提出的蒙古高原上的回鹘人，抑或是李盖蒂提出的，与一个小家族相对的一个较大的回鹘部族) 中，但遗憾的是，词组 *ئەنەن* 的含义我们并未获悉。迄今为止关于 *ئەنەن* (正如克劳森提出的那样，该词由于是以 “n” 为首而不可能是一个突厥语词汇) 一词最有力的假设是，其可能来源于粟特语 *Ni-yo-shag*，意为 “摩尼教信徒”。参见 Moriyasu 1980: 181。

前往他们的东北方，有(89) **හිෂ්පාරු** 一部族，[其]从 **ගුජ්ජාජ්ජාක්ස** 古突厥人中分离而出，并有一支一千人的军队¹²³。

至其西北，有 **සේංචු** 一部族，其有五千军队，他们与 **හිෂ්පාරු** 一族斗争。

在其西面，(91) 有突厥人 **හැජුජ්ජාජ්ජා**¹²⁵ 一族，并且这一大部族是很幸福的；因而他们被称为花斑马古突厥人。

在他们的北边，在荒漠大山脉之外，(93) [有] 被称作 **හුද්දන්දාජ්ජා** 的一群人¹²⁶。[他们的] 脚像牛蹄子并且 [他们的] 身体覆盖¹²⁷ 着毛发。

在此方向以外，(95) 有一群野蛮的突厥人。野蛮人中一人的一条腿断了，并且由于他不能行走，[他的] 朋友在 [他的] 断掉的腿前杀了一匹马。然后 [他们] 搜集了许多的木材并 (97) 递给 [他] 一个打火石。[他们] 将 [他] 丢在那儿。不一会儿，一只完全筋疲力尽的老虎靠近了那条断腿。在老虎身后，[那儿来了一些东西]：身形较鼠类更大，(99) 其毛发和铁器一样坚硬，脖子和腹部两侧各有一个约一个大拇指 [大小] 的白色斑点，且由于断腿的士兵 (101) 向其白色的腹部射了一箭并杀了 [它]，至于 [它的] 身体，其像猪一样弯曲，谈及它的毛发，其像铁制武器一样坚硬有刺，其毛发从鼻端 (103) 开始直至尾巴末梢，像矛一样尖锐。在突厥语中，它被称作 **හැජුජ්ජාජ්ජා**¹²⁸ [……]

123 这两个族名都没有得到确认。

124 其为佩切涅格人 (Pečeneg)，他们于8世纪后半叶的某时从咸海 (the Aral sea) 之北迁徙至里海之北。在10世纪早期穆斯林旅行者伊本·法德兰 (ibn Fadlan) 曾于里海北侧的地域遇到了佩切涅格人。关于佩切涅格人的研究请参见 Pritsak 1981 和 Golden 1992: 264-270。

125 这一部落已经由李盖蒂比定为马赫穆德·喀什噶里 (Mahmud Kashgari) 记载的 Alayonluq，一个乌古斯 (Oghuz) 部族，见 Ligeti 1971: 181-182。藏文“花斑马”是古突厥语的逐字对译：*Hala/*Ala=හිෂ්පා; yund=හිං; luq=හුං。Toru Senga 将 Ha la yund log 译为“带有花斑马 (的人)”，居于“西西伯利亚低地的南部，位于其沼泽地带且在鄂毕河与伊希姆河之间”，参见 Senga 1992: 66。

126 突厥语：Ud hadaglig。再一次，“牛蹄”的对应藏文是对突厥语的字面翻译，参见 Ligeti 1971: 182。Senga 提出 Ud hadaglig 居于乌拉尔河 (Ural) 以及托博尔河 (Tobol) 的上游河谷地带 (参见 Senga 1992: 68)。令人惊奇的是，在《鞑靼史》(Historia Tartarorum) 中提及的一群人似乎正对应 Ud hadaglig：“最后，他们来到了被称作 Ucorcolon (意为‘牛蹄’) 的一群人那里，因为 ucor 是鞑靼语‘公牛’，colon 是鞑靼语‘脚、蹄’；或相反，被称作 Nochoyterim (即‘狗头’)，nochoy 是鞑靼语‘狗’，terim 是鞑靼语‘头’。他们脚踝以下有像牛一样的蹄子，有从后脑勺至耳朵这一部分像人，面容这一部分很像狗的头，正因如此，他们的名字来源于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形似怪物。”参见 Skelton *et alia* 1965: 75.

127 藏文 ག්ජාජ්ජා 之义为“插入，嵌入”(参见 Jaeschke 1998: 564)。在这一文本中，Ud ha dag leg 的身体“夹杂着”或是覆盖了毛发。

128 从文本的语境来看，හැජුජ්ජාජ්ජා 似乎是古突厥语“刺猬”或“豪猪”，但没有学者能够在古突厥语或是现代阿尔泰语系语言中找见这个词的相关痕迹。

(104) [……] 好的 [……] 并且看见了这只老虎和这只刺猬 (刺猬)¹²⁹ 在那儿打架。(105) [……] 直至治愈 (?)；老虎杀了那只野兽。(106) [……] 这个士兵的份额 (?) 和他人的相似；这件小的衣服 (107) 当骨头向右移动时 (?) [……] 尖叫；他的 (108) [……] 里面的一个 (……)。

参考文献：

- Bacot, Jacques. 1956. "Reconnaissance en Haute Asie Septentrionale par cinq envoyés Ouigours au VIIIe siècle," 《8世纪五位回鹘使节对北部高地亚洲的考察》. *Journal Asiatique* 244 : 137-153.
- Beckwith, Christopher. 1987.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吐蕃在中亚》.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egel, Yuri. 2003.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entral Asia* 《中亚历史地图集》. Leiden: Brill.
- Chavannes, Edouard. 1942. *Documents sur le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西突厥史料》.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 Clauson, Gerard. 1957. "À propos du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 1283 号》. *Journal Asiatique* 245: 11-24.
- Czeglédy, K. 1958. "Bahrām Čōbīn and the Persian Apocalyptic Literature," 《贝赫拉姆·索宾和波斯的天启文学》.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8: 21-50.
- 1972, "On the Numerical Composition of the Ancient Turkish Tribal Confederations," 《论古突厥部族联盟的构成》.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5: 275-281.
- Golden, Peter.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突厥语族诸民族历史导论》.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2001. *Ethnic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re-Činggisid Turkic Eurasia* 《前成吉思汗时代欧亚大陆操古突厥语民族与政权的形成》. Bloomington: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 Grousset, René. 1991.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草原帝国》.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epr. 1970).
- Hamilton, James. 1962. "Toquz Oyuz et On-Uyyur," 《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鹘考》. *Journal Asiatique* 250: 23-63.
- Hambis, Louis. 1958. "Kästim et Ges dum," 《克失蒂迷与 Ges dum》. *Journal Asiatique* 246: 313- 320.

129 古藏文 རྩྚ = 现代藏文 རྩྚ, “刺猬或更可能是豪猪” (参见 Jaeschke 1998: 103)。关于刺猬在阿尔泰神话中扮演的角色, 参见 Taube 1991: 339-354。

- Imaeda, Yoshiro and Ariane Spanien. 1979.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2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文文献选录》卷二 .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Jaeschke, H. A. 1998.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藏英词典》. Richmond: Curzon (repr. 1881).
- Kara, György. 1996. "Aramaic Scripts for Altaic Languages," 《阿尔泰语系中的阿拉米文》. in Peter T. Daniels and William Bright (eds.), *The Worlds Writing System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36-558.
- Lalou, Marcelle. 1961.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III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卷三 .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 Li Fang Kuei and W. South Coblin. 1987.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古藏文碑铭研究》. 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Ligeti, Louis. 1971. "A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 " 《论〈北方诸王统叙记〉》. 载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166-189.
- Mackerras, Colin. 1969. " Sino-Uighur Diplomatic and Trade Contracts (744 to 840)," 《唐—回鹘外交贸易文书研究 (744—840 年)》.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3.1: 215-240.
- 1973. *The Uy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 《唐史视角下的回鹘汗国》.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rolina Press.
- Minorsky, Vladimir. 1948. " Tamī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回鹘之行》.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2.2: 275-305.
- Molè, Gabriella. 1970. *The T'u-yü-hun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北魏至五代的吐谷浑》.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Moravesik, Gyula. 1983. *Byzantinoturcica*. vol. 2. 《拜占庭与古突厥研究》卷二 . Leiden: Brill.
- Moriyasu, Takao. 1977. "Tibetto-go shiryō chū ni arawareru Hoppō minzoku - Drugu to Hor," 《藏文史料中所见的北方民族 Drugu 与 Hor》. 载 *Ajia Afurika Gengo Bunka Kenkyū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4: 1-48.
- 1980. "La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es mots Hor et Ho-yo-hor dans le manuscrit Pelliot Tibétain 1283," 《伯希和 1283 号藏文文书中 Hor 和 Ho-yo-hor 二词新释》.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4: 171-184.
- Rnam rgyal tshe ring. 2001. *Bod yig brda rnying tshig mdzod* 《古藏文辞典》. Beijing: Krung kho'i Bod rig pa dpe skrun khang.
- Pelliot, Paul. 1959-1973: *Notes on Marco Polo*. 3 volumes. 《马可·波罗注》. Paris: Adrien Maisonneuve.
- Pritsak, Omeljan. 1981. "The Pečenegs. A Ca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佩切涅格人——社会与经济转型的一个案例》. 载 *Studies in Medieval Eurasian*

- History*,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chapter X.
- Pulleyblank, Edwin G. 1956. "Some Remarks on the Toquzoghuz Problem," 《关于九姓乌古斯问题的几个看法》.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28: 35-42.
- Senga, Toru. 1992. "«Northern» Neighbors of the Khazars around 750 A.D.," 《约公元 750 年前后可萨人的北方邻居》,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64.
- Sinor, Denis. 1982. "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urks," 《突厥起源传说》. 载 Egle Victoria Žygas and Peter Voorheis (eds.), *Folklorica: Festschrift for Felix J. Oinas* 《Felix J. Oinas 纪念文集》. Bloomington: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141: 223-257.
- 1985. "Some Component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Türks (6th to 8th century AD)," 《古突厥文明的若干构成要素 (6—8 世纪)》. 载 *Altaistic Studie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25th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at Uppsala June 7-11, 1982*. G. Jarring and S. Rosén (ed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45-159.
- 2002, "Random Remarks on Metallurgical Themes in Pre-Modern Inner Asia," 《近世内亚冶金史漫谈》. 载 *Scripta Ottomanica et Res Altaica. Festschrift für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zu ihrem 60. Geburtstag*. I. Hauenschmid, C. Schönig and P. Zieme (ed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97-312.
- Skelton, R. A., Marston, Thomas E. and Painter, George. 1965.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文兰地图与鞑靼记述》.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 R. A. 1988. "Tibetica Antiqua V: La religion indigène et les Bon- po dans l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古代藏学研究：敦煌写本中的本土宗教与苯教徒》. 载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77: 27-56.
- Taube, Erika. 1991, "Der Igel in der Mythologie Altaischer Völker," 《阿尔泰民族神话中的刺猬》. 载 *Altaica Osloensis. Proceedings from the 32nd Meeting of 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Oslo, June 12-16, 1989)*, Bernt Brendemoer (ed.),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339-354.
- Tucci, Giuseppe. 1950.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吐蕃赞普的陵墓》.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Uray, Géza. 1981. "L'emploi du tibé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étaine," 《吐蕃统治结束后在甘肃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文的历史》. 载 *Journal Asiatique* 269: 81-90.
- Yule, Henry. 1965.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2《东域纪程录从 古代中国闻见录》卷二,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repr. 1889).

◆ 作者: [美] 费德里卡·文图里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研究所教授

翻译: 吐送江·依明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陈泳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An Old Tibetan Document on the Uighu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ederica Venturi¹, Chinese translation by Tursunjan Imin² and Chen Yongjun³

(1. Indiana University; 2. 3. Lanzhou University)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 P.t.1283 presents important historical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urkic and Uighur people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document, i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extensiv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esents one of the scholarly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is document. The first half of the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P.t.1283 document, address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its title, language, and original source. It also includes a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conducted by earlier scholars. The second half of the paper offers a new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t.1283 documen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sec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or where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problematic.

A Tibetan Inscription by IHa Bla ma Ye shes 'od from Dkor (Spu) Rediscovered

Laxman S. Thakur; Chinese translation by Li Jun

(Himachal Pradesh University; Postdoctor of Central Academic of Fine Ar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s, the author provides a new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carved on a stone stele located at the village of Dkor (Spu), Kinnaur. Although badly damaged, this inscription records the name of Ye shes 'od and the events of the commission of his sons to Dkor during a dragon year. The date of this inscription is the wood dragon year of 1004 CE, which then leads to the inference that Ye shes 'od was still alive in 1004.